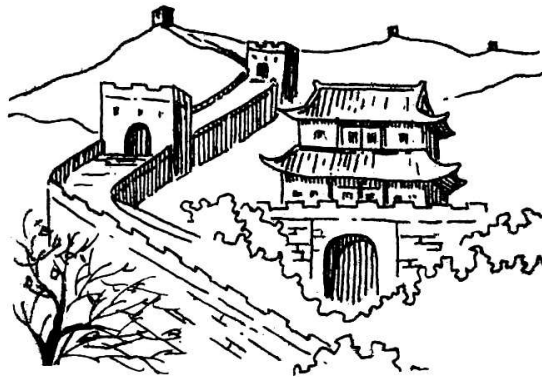


從中國教會的經驗 談地方教會



劉賽眉

編者按：本文是去年十二月在芝加哥所舉行的「北美天主教徒關心中國小組」周年會議的演講之二。

首先，我感謝這次會議的籌備委員會給了我這個機會，使我能夠在此與您們一起探討中國教會的問題。相信您們都知道，這個問題是如何複雜與棘手，尤其是當觸及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時，問題更是敏感。因此，我想在演講開始之前，先說明我的意向。作為一個從事神學工作者，我希望從神

學的角度去反省一下中國教會的經驗，包括她目前的問題和未來可能的出路。作為一個中國信徒，我亦希望在信仰中再一次去肯定，在中國教會所遭遇到的種種痛苦之中，天主會在聖神內重新帶給中國教會合一的恩惠。本演講的重點不在於批判過去和現在，而在於注視未來，換言之，我希望從教會學的

角度去反省，是否中國教會能夠為自己創造出一個新的教會模式，以打破目前的僵局。

天主教傳入中國已超過四百年歷史。在這數百年間，天主教在中國由文化的衝突轉向政治上的衝突，十七世紀的「禮儀之爭」，可以說是文化衝突的高峰，天主教當局未曾了解到中國文化中「祭祖」的真正意義，禁止中國教徒實踐這被視為是中國文化一部份的悠久習俗，因而引致中國的皇帝頒下禁教令，使中國教會陷入政治勢力的迫害。

到了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毛澤東最初以為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為中國的未來打開了一條希望之路，遂急於把中國帶上共產主義的道路，冀望藉着政制的徹底改變來拯救這積弱已久的「睡獅」；豈料治國方針之偏誤，為新中國帶來了許多深刻的創傷。無論如何，由於在五十年代，羅馬天主教

對無神的共產主義採取強硬和勢不兩立的態度，頓使處於共產政權下的中國教會，產生了進退為艱的矛盾：一方面要忠於教宗，另一方面又要愛自己的國家。他們要在二者之間作選擇，結果，由於信徒的選擇不同，使愛國會與忠於教宗者之分，日形尖銳。究竟在愛國與忠於教宗之間有沒有第三條綜合性的出路？這正是關心中國教會的人士所努力去探討的問題。無論如何，目前中國教會仍在這夾縫中掙扎，至於未來的出路如何，一方面固然有賴於中國教會在具具體環境及經驗中去尋找，另一方面海外各地教會亦需要在不斷的關注與接觸中去協助她反省和分辨。

這個演講的焦點集中在毛澤東時代以後中國教會的轉變和發展上，嚐試在這些改變中去發現中國教會之作為地方教會所要面對



十七世紀中國禁教時期的地圖和殉道者。

的神學問題。

(一) 一九七九年至今的中國教會的立場和方向：

一九七六年是中國很重要的一年，在這年內，三位中國的領袖人物相繼去世，他們就是朱德、周恩來、和毛澤東。同年，四人幫被捕，從此，中國的局勢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由極左的共產主義路線轉回較緩和的社會主義路線。鄧氏重視經濟發展，以「四個現代化」為治國之大目標，在此目標下，中國重整了她對內及對外的政策。在現行的新憲法內（一九八二年頒佈），可見八十年代的中國，有意以五零年代初期的中國為基本模式，繼續向前發展。中國國策的全面性調整，當然也包含了對「宗教政策」的修正。

(1) 愛國會的立場與方向：

一九七九年，中國共產黨在第十一屆中委會上表達了「宗教自由政策」以後，全國性的宗教事務局和地方性的宗教事務處相繼復興，而愛國會亦逐漸開始活躍，在這兩大機構的計劃和推動下，至一九八三年為止，中國大陸在各地開放了聖堂約共三百多座；培育司鐸及教會接班人的修道院，先後在佘山（華東區）、北京、沈陽（東北區）和花園山（中南區）重開。由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底，愛國會祝聖了十四位自選的主教。據報導，目前全國教友的總數為三百萬。

愛國會最近正努力配合國策而從事教會本地化的工作。當然，我們能夠得到的資料大部份是來自愛國會自己的報導。「中國天

主教」這份刊物是他們的重要喉舌，現已出版至第七期。在該刊物第四期裏，愛國會的主教清楚地表達了他們在建立本地教會過程中的立場和方向：

- 獨立自主，自辦教會。
- 站在人民的一邊和為人民服務。
- 積極參與廣大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建設。
- 教會自治，由本地神職人員管理自己的教會。
- 建立適合本國國情、民情、和文化的神學。

論到中國教會在牧民方面的任務，「中國天主教」（第四期）亦十分明確地表達了：

- 重質不重量，並非為增加教友的數目。
- 領導和鼓勵教友及神職人員投身於社會建設，為人民的身心謀福利。
- 以生活及善表來傳福音，引人歸主。

(2) 其他中國天主教徒的立場和方向：

在中國教會內有另一部份信徒，他們的立場和方向與愛國會不同。他們雖生活於社會主義的制度下，但他們對共產主義抱着不妥協的態度，對於愛國會與中共政府的關係甚不贊同。他們為了公開宣認與教宗的合一，甘願犧牲個人宗教自由的權利，甚至受牢獄之苦。他們本無意直接反對政府，而只是想向政府表明大部份的中國教徒不贊同愛國會的立場。

最近在上海再度被捕的四位耶穌會士便是這種立場和方向的例子。這幾位耶穌會神父在一九五〇年代曾被捕入獄，後獲釋。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再度被捕，被控以反動份

子的罪名。一九八三年三月這幾位神父被判入獄，刑期皆在十年以上。

此外，尚有一些信徒，他們既不公開反對政府，亦不參加愛國會，他們當中有一部份拒絕到愛國會重開的聖堂參與禮儀，而在家庭中私下聚會和祈禱；另一部份人士雖然不完全接受愛國會的所有觀點，仍到重開的聖堂參與禮儀，領受聖事。這一部份信徒所關心的是忠於教宗，對於愛國會所主張的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地方教會，不能接受。他們的傳教方式是在家庭及親友當中，以私人傳遞的方式進行。

(二) 中國教會需要一個新的教會模式：

整個中國教會（包括愛國會及其他天主教徒）的復甦只是短短幾年內的事，現在若要談中國教會在本地化上的成果未免言之太早。中國雖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在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政權下生活還是第一次，而且僅有三十年左右的時間。既然社會主義的統治目前在中國已成爲鐵一般的事實，則生活在此政制下的中國教會不能不去反省下面的幾個問題：(1) 教會如何在此政權下繼續生存？(2) 在此環境下生存的教會如何方可從事本地化的工作？亦即是：如何使福音在現代中國的生命中紮根？(3) 如何在中國具體的環境和經驗中去發現耶穌基督的新面孔，並把這新的面孔表現在中國教會身上？

從信仰的角度看，既然天主是人類歷史的主宰，故我深信在歷史的現刻，天主賦給中國教會一個先知性的使命，就是：在痛苦的淨化中去誕生一個新的教會模式，這模式爲所有處於社會主義政權下的地方教會提供

基督徒如何在中國
具體的環境和經驗中
去發現基督的新面
孔？



照明和參考之作用。因此，中國教會在履行這項使命上的成功與失敗，實在與普世教會有關，普世教會不能不關注她。雖然中國教會並非是第一個處於社會主義政權之下的地方教會，但是中國教會人稀力薄，既不能與全中國人口成比例，更無法與波蘭教會相提并論，故此，中國教會的求存經驗是唯一而

獨特的。

中國教會雖肩負重大的先知性使命，但作為一個由人組成的團體而言，她有自己的欠缺和限度。經過約三十年與外隔絕的生活，中國教會在思想、知識、和視野方面顯得略為落後，對普世教會及其神學的迅速改變和發展，所知不多。

按我個人的反省，也許「受苦之僕」的模式可以適合中國教會。無論愛國會或其他天主教徒的立場和方向如何，畢竟，二者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在共產政權下遭受過困難。基層基督徒的苦難啓示了：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的精神聯繫不會因任何外在勢力而割斷；爲了保存這段聯繫，不少信徒交付了他們最美好的歲月，在沉默中作了見證，有些甚至犧牲了性命。的確，沒有什麼比死亡和血的見證更有力，這部份的信徒實在是以苦難、以血、以生命來作證了一端真理——真正的地方教會需要在信仰及精神上與普世教會共融。

然而，基層基督徒的苦難除了作證真理以外，還應進一步指向復活——中國教會的真正復興，這復興包括了中國教會的內在和外在的修好。事實上，由教會悠長的歷史可以見到，教會不可能長期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否則，縱然不被消滅，亦將因變成「私人」的宗教而漸趨枯萎或變質，日本教會史上的「隱藏基督徒」（HIDDEN CHRISTIANS）足以借鏡。無論在任何政權之下，教會都必需爭取宗教信仰自由（即使這自由十分有限）。一方面，固然因爲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權之一；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在本質上需要公開表達、並藉公共的禮儀標記和崇拜形式以維持信仰的統一發展。「地下」生存的方式既非永久之計，亦非世界

各大宗教的一貫生存方式，爲此，不論愛國會或其他天主教徒，都應力求公開表達信仰的自由。至於如何能夠不必加入愛國會而可以有效地獲致最大宗教自由的權利，則屬另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同時，整個中國教會最大的限度，亦在於不了解三十年來普世教會對各種主義和思潮在態度上的變遷和演進。

論到愛國會，在適應新政權並爲中國教會尋找一條新出路的過程中，亦受了許多壓力和痛苦。他們在政府所指定的容忍宗教的政策下生活，因面對國內外信徒的拒絕和不了解而受苦。有些人甚至視他們爲「裂教」。此外，他們的苦難亦在於承擔和摸索去建立一個「地面」的中國教會。無可否認，近年來他們是爲了教堂及修院的重開而盡了不少力量。他們的苦難啓示了另一個事實——地方教會的自立性。

雖然愛國會的代表在公開發言時（尤其是對教宗），言詞過於強硬，難以獲得別人的同情，但他們目前在國內所從事的各種復興工作，委實是想爲本地教會打開一條新的出路。可惜，他們所強調的獨立自主走向極端，反使一個地方教會所應有的自立性含糊不清。

中國教會固然要獨立自主，而且她既然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也應當在這具體的環境中謀求宣傳福音的出路，但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教會是否一定要割斷與普世教會在精神及信仰上的聯繫？事實上，中國教會若要成爲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地方教會，而非一種「裂教」（相信這並非她的最深意願），則她必須逐漸展開與普世教會和各地方教會的交談。其實，若一個團體只是爲了獨立而獨立，便毫無意義。人類的獨立自由最後

是爲了能夠建立深刻和成熟的人際交往；各地方教會的獨立亦復如此。由此，深盼愛國會在尋求獨立自主的過程中，亦能把握住獨立的最深含義。

綜觀上述愛國會及其他中國天主教徒的痛苦和限度之後，我認爲，兩者的痛苦爲中國教會的未來都是有益的，如果中國教會能夠好好的去接受這些苦難的痛楚，則這些痛苦會成爲「產生一個新團體」的產痛；當一個既與普世教會合一又保持自己的自立性的中國教會誕生時，一切痛苦都會變成喜樂——復活的喜樂。同時，作爲「受苦之僕」的中國教會亦可在她的苦難和復活中，向各地教會昭示一個嶄新的模式。

（三）實際問題：

（1）人材培育的問題：

自從五〇年代，天主教大修院陸續被徵用和關閉以後，對於培育新血，便造成了很大的困難。而且由於鐸職人員的缺乏，使到今日復甦的中國教會面臨「日漸衰老」的困難。綜觀國內的神職領袖，大部份已年逾六十，若要振興中國教會和從事本地化的工作，增添新血和培育人材成爲今日中國教會急不容緩的任務。雖然，修道院在各地逐漸重開，但教授人材和培育導師仍十分缺乏，此外，教材及書籍等亦很貧乏。也許，海外的各地教會能夠在這方面提供一些適當的協助，特別在參攷書籍的供應方面。此舉必有助於友誼的建立和交流。

（2）海外教會能夠作何貢獻？

當談到關懷中國教會的未來的問題時，海外的人士都會問，我們能爲中國教會作出

什麼具體的貢獻？

——我個人認爲，海外各地教會首先要做的是認識清楚中國教會的現況，以及客觀地找出什麼途徑爲中國教會的未來是可行和有益的。

——最重要是不可加深中國教會內的裂痕，並應認識中國的政治背景及其宗教自由政策放寬到什麼程度。在此，那些不贊同愛國會爭取宗教自由方式的海外人士，是否可以在反對這種方式之外，積極地爲中國教會想一想，提供一條既可使國內教會合一、又可爭取較大宗教自由的途徑？至於那些接觸愛國會領袖的人士，是否可以協助他們改善對普世教會的態度？對於那些經常有機會接近基層信徒的人士，可以與他們共同祈禱，舉行聖經分享，藉此我們可以學習到他們的堅強信心，而他們亦可學習到國外信徒的交談態度。

——可以盡量把握機會接觸在歐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他們之中大部份會返國服務，由於他們將會是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和領袖人物，若與他們多接觸，將會逐漸使他們更了解基督宗教的真諦。

最後，我認爲，除了專門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各中心有責任負起「橋樑」的任務以外，海外各地方教會亦有「橋樑」之責，各地教會主動地對中國教會的關懷和接觸，實有助於中國教會走近普世教會。有不少人研究「愛國會」是否「裂教」，但我們認爲在未有證據證明其爲裂教之前，我們不能就此下結論，目前，真誠的關懷比批評更有益。